

全球女权主义口述史访谈课题——高小贤

采访者：王政

Q: 小贤,我想就是要了解一下啊,因为你是陕西进行了很多的活动,做了很多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那么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你是怎么开始来从事女权主义的这方面的活动的.

A: 嗯,这可能跟我个人的经历有关系吧.我是77届的大学生,也就是说那个文化大革命以后,恢复高考第一届的大学毕业生.那么我们那一届毕业生分配的时候,基本上都分配到了...因为当时一个大背景是中国政府强调干部的四化嘛,就是所谓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所以第一届大学生毕业全部都分到了党政机关去了,这样阴差阳错呢我也就走进了妇联.

Q: 那是哪一年你到妇联工作?

A: 82年,82年1月份.

Q: 陕西省妇联?

A: 陕西省妇联.那么在妇联工作的时候呢,当时因为我是省妇联历史上第一批直接由大学分配来的大学生,所以妇联也满重视的,从领导的角度呢,他们认为把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给我了,就是在办公室搞综合,负责起草一些工作报告,一些领导讲话,那么我也因此有机会看到很多就是各县妇联的一些调研报告,一些文件啦等等.82年那个时候刚刚是中国文革之后,整个的一个...就是在农村责任制也刚刚开始,那么从整个社会来说也是一个大的社会转型的前奏吧.那么由于文革十年呢,当时农村有很多很多新出现的问题,比如说那个,买卖婚姻.从一开始...那么这个买卖婚姻,从一开始同时也还有很多的妇女就直接抗婚,逃婚,等等.接触很多这样的事情.那么我呢,自己个人的经历呢,就是说,在文革...文革这十年培养了我们这一代人太多那种对社会的责任感.我原本进大学是想做一点社会科学研究,希望对中国社会的整个民主化进程呀,或者政治改革呀,有所贡献.那么到妇联以后呢,等于破了我作研究的梦了.那么在接触到这样大量的(反映)现实(情况)的文件之后呢,我就觉得,--我还是想作研究嘛--所以就选择了...当时中国的社会学刚刚恢复,所以我就想做一些婚姻家庭研究,做一些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做一些妇女问题研究,这也就是可能最初对妇女问题的关注的开始吧.

那么这中间有几个很重要的机会.一个就是说是1984年,1984年的时候呢,全国...现在的中华女子学院的前身,是中华女子干部管理学院...

Q: 嗯.妇女干部管理学院.

A: 中华女子干部管理学院的前身是中华妇女干部学校.当时他们正准备一个转型,要变成,就转型到大专制的干部管理学院的时候缺教材.所以它就向各省选派一些人呢,去做这些教材的编写.我有机会呢...当时因为我对妇女研究感兴趣呢,我也主动地申请呢去参加这个教材编写班.那么我就84年的...在北京待了整个一学期,3月份到7月份吧.那么这一学期是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转折.如果是我

刚刚开始妇联的,那时我还是对婚姻家庭问题感兴趣,那个你可能知道一个大背景,中国社会学刚刚恢复的时候,主要关注的是婚姻家庭问题.也由于当时还有个背景就是(新)婚姻法刚刚颁布.很多新的婚姻问题出来,对吧.那么,这个,这半年的学习是我的一个很大的转折.就是我有机会看到30年代,30年代中国的妇女研究.一些象那个沈..什么,沈君慧吧.

Q: 对.

A: 沈君慧,还有刘王立明.他们写的书我在那个时候都看了.

Q: 噢,噢.就是中华妇女干部管理学院,他们妇联的历史档案材料.

A: 因为我们要编一本大专班的教材嘛,所以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也没有现成的东西嘛,他们就把历史上所有的东西都拿来让我们看,也包括罗琼,那个三四十年代写的东西,五十年代写的东西都有机会去看到.

Q: 包括刘王立明的也看到了?

A: 刘王立明的也看到了.所以看到了那些东西以后啊,当时的感触啊,我就觉得80年代那时候的中国妇女的研究还比不上30年代.那时候的,包括倍倍尔的那个〈妇女与社会主义〉.

Q: 也看到了?

A: 都看到了,啊,都看到了.那是我一个,就是说,一个短暂的,集中的对中国在,就是说在这个20世纪上半期一些妇女研究的一些成果的一个学习.所以当时就激发了我对妇女问题研究的一些兴趣.我就在思考,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妇女解放运动都这么多年了,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以前,如果说在没有接触到这些东西以前呢,我们一般人习惯呢,简单地用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就认为是,最初认为,男女不平等是一种阶级压迫,对吧?

Q: 对.

A: 从《起源》里面看到的,那么紧接着又认为是一种什么,就是说,由于社会化生产不够发达,家务劳动没有社会化,这都是我们概念化的理解.但是到80年代,那时候我觉得这些都不足以解释当时我们面临的这些复杂的,很多的问题了.激发了我的兴趣去重新思考这些问题去,那么这是,这应该看作就是我从那个对妇女问题研究兴趣的一个开始吧.

Q: 那你后来,84年的那个学习回来以后呢?

A: 84年学习回来以后呢,很有意思,熟悉中国这个改革开展这20年历史的人都知道,84年前后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向城市迈进的开始.那么随着城市改革的开始化呢.很多出现新的妇女问题.企业招工不要女的,然后女大学生分配不出去,等等问题都开始出现来了.那在这种大的社会环境背景下呢,全国妇联也开始在思考妇女研究了.84年12月是全国妇联的第一次...

Q: 理论...

A: 理论研讨会. 我的办公室主任去参加那个会去了. 她回来后, 她把全套文章给我了. 我就非常高兴. 我就说, 妇联系统也开始关注这些问题来了. 那么我就跟我的领导商量陕西也能不能开这样一次研讨会.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妇联那边也在做机构改革. 全国妇联呢, 在这个背景下, 成立了自己的研究室, 那个底下各省妇联呢, 也就上行下效, 那个...模仿, 仿照上层吧. 我们 1985 年 1 月份呢, 省妇联的机构改革, 我也就成了新成立的研究室的副主任.

Q: 啊, 主任是谁啊?

A: 主任是一个老干部, 年纪比较(大), 她可能也基于就是我呢, 一个对妇女研究感兴趣, 在这之前呢, 我可能还没跟你提过, 我到妇联来就是研究的那个心还不死, 利用自己下乡访点的时候做点社会调查, 写点文章, 所以 84 年也参加了《家庭》杂志召开的第一届关于家庭问题的研讨会.

Q: 这是你第一个官衔, 是吧?

A: 第一个官衔. 那么到了这个官衔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他们领导说, 能不能召开一次妇女理论...

Q: 研讨会。

A: 研讨会. 当时我就叫“改革与妇女研讨会”. 然后也想成立一个什么呢, 妇女理论研究会. 这个想成立研究会, 当时的背景啊, 对 NGO 不了解, 不是说想成立一个妇女 NGO 组织. 当时的背景是和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科学的那个拨乱反正重新繁荣有关系. 当时你可能也在国内吧?

Q: 对, 对.

A: 各种新学科纷纷成立学会. 因为妇联的这个情况, 当我们 80 年代进妇联的时候, 干部基本上是老化的, 老干部比较多一些, 年轻人很少, 知识结构非常单一, 上过大学的人也很少, 所以妇女研究不可能在省妇联干部内部中找到组织阶层的队伍. 那么必须向外看. 所以当时也就想成立这么一个学会. 那么这个学会还没有, 就是说, 领导初步同意, 还没有开始正式征集文, 没有开始组织正式筹备的时候呢, 我又偶然间看到南开大学在举办一个社会学研究方法培训班, 收费的, 但收的费用不多. 哎呀, 我就心想去了. 因为毕竟我是学历史的嘛, 社会学自学不行呀, 我还是想去有点训练. 我就去找我们主席去了. 我们主席挺明智的, 她的明智也可能她的女儿呢, 也想参加一个类似的文学系统的培训, 结果她的女儿的领导就是不批, 她的女儿气得要命, 然后她可能出自这种可能切身感受吧. 她觉得可能, 当领导的可能还是要怎么, 要开明一点, 所以她同意我去了. 那我这半年在南开的培训非常好的一个训练. 因为那时中国社会学刚开始嘛, 那个研究方法培训班使我接触到了很多的国外的, 就象一些社会学家, 象当时讲社会学理论呢, 我记得是一个叫蔡什么¹, 是一个美国的华裔, 是从台湾去美国读的社

¹ 蔡文辉。

会学的一个社会学教授.那么教研究方法的是那个林南,也是美国的.在社会学方法上,还有一些象费孝通呀,他们都去给我们讲过课.

Q: 噢,是吗? 85年?

A: 85年.

Q: 半年的学习?

A: 半年的很好的方法的学习.那么训练回去以后呢,紧接着就开始筹备那个研究会.在这中间有个小插曲,就和李小江的关系.其实我在84年的时候就看到《未定稿》上李小江登的那篇文章了.那么当时我就觉得...

Q: 哪个上面登的?

A: 《未定稿》.

Q: 啊,一个刊物?

A: 《未定稿》是一个内部刊物,是我们在80年代关心社会科学这方面的人都比较喜欢的一个刊物.它的思想稍稍超前一些,就是一些不适合正式公开发表的问题都在里面先发表,所以我自己看到她那篇文章后,我觉得她还是当时我所看到的妇女研究中间我觉得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

Q: 什么题目?

A: 我现在忘了.好象题目应该是关于马克思主义...

Q: 妇女解放理论还是什么?

A: 对,好象是那个.她在80年代最初的两篇稿子,一个是登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上,一个是登在〈未定稿〉上的,那个文章,我当时去中华女子学(院),就是...

Q: 妇女干部管理学院。

A: 学习的时候,我就带着那本〈未定稿〉去的.当时呢,罗琼对那个有意见,可是我回来筹备这个会的时候,我想我一定要请李小江参加.我给李小江写了封信.我说你那篇文章我觉得是我目前看到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我们陕西省也想开这么一个改革与妇女研讨会,我特别希望你能来参加.给她写了一封信.没想到她呢...我的会务因为我去南开,我就推迟了,我就没有开始筹备嘛,她倒邀请我参加85年她的第一期的暑期的研讨会.所以在那个会上就是...我从南开一回来,很快就去她的会上了.去她的会上呢,见到了就是说杜方琴,上海的一拨人,上海的那个...

Q: 那是85年,是吧?

A: 85年7月份的时候. 在那个会上, 就是跟一拨子中国妇女研究的人, 等于是有热情的人相遇了, 我觉得大家都挺兴奋的, 都觉得谈了很多的一些想法. 那么, 这个...这就是一个. 回来以后呢, 那么86年我就召开了我的“改革与妇女问题研讨会”.

Q: 你是也是全国来参加的?

A: 全国的. 我那个会开得呢...其实当时在全国80年代开的非常有影响的一次会. 很多人都因此在那儿有一个转折. 你比如说, 李小江去了, 谭深的整个女性思想启蒙都从那儿开始的. 她跟李小江在一个房子住着, 在我的那个会上.

Q: 是86年?

A: 86年。

Q: 你是86年几月?

A: 6月. 6月. 我记得是6月8号, 6月8号开的会.

Q: 题目就叫“改革与妇女研讨会”?

A: “改革与妇女研讨会”. 那个王行娟也去了, 那个谁... 刘达临也去了, 那时社会学界的刘英也去了, 还有呢, 梁军也去了.

Q: 一共多少人?

A: 呀! 一共有, 好象有60多人吧.

Q: 60多人. 你怎么发邀请的呢?

A: 我是那样的, 我是省内广泛征文, 广泛征文. 外省的话呢, 是他们知道信息以后呢, 分别要求来的. 我是采取这个... 省内是整个的一个征集论文, 论文入选了以后呢, 就邀请来. 还有呢, 就是我们重点邀请了几个人. 李小江是我们请的, 刘达临是我们请的, 那个邓伟志是我们请的. 就是说, 之所以请他们呢... 好象刘英, 也是请的; 准备请4个人, 就是我觉得陕西的研究力量不足. 大家刚刚才认识. 就每天的那个研讨会是采取这样的办法: 上午有两个人主题发言, 然后就是他们讲, 可能有半个小时, 然后再就大会发言, 就是论文, 就是小组讨论, 是希望用那个...当时我也不知道叫主旨发言, 用主要的那个发言把那个能够...水平能够提高一点. 没想到真的是影响非常好. 几个因素: 一个, 李小江的第一篇发言, 不但是研究的人反映好, 连我们刚上任的妇联主席都认为好—她是从公检法司系统调来的一个新主席, 她觉得她到妇联来不知道怎么干, 她突然间觉得呢好象眼睛一亮, 知道下一步她该怎么样, 抓什么工作了. 对妇联是个冲击. 噢, 佟新也去了.

Q: 佟新也去了?

A: 作为当时刚刚社会学系的大学生也去了. 那么还有就是一些省妇联系统的, 象河北的呀, 还有吉林的呀, 几个. 上海的那个谁也去了... 上海的当时那叫荒沙吧-- 就是最早的那个, 老的那个, 刚成立的那个第一届上海妇女理论研究会 - 它的秘书长, 他们都去了. 他们都说回去怎么样更好开好他们的会. 全国妇联也来了. 那个会真的也是一个, 挺好的一个, 等于是一个动员会. 那个会上就学会成立了, 研究会成立了. 我们当时的名字叫“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 为什么我们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呢, 因为 82 年全国妇联有一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 它再向省级要征集团体会员, 然后全国妇联又在酝酿成立一个妇女理论研究会. 也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你也知道, 84 年我们在编那个教材的时候, 倒底是叫妇女学, 还是叫妇女理论, 还是叫妇女研究, 有很多这个... WOMEN STUD(IES), 有很多的讨论. 中国妇联还用了一个妇女理论. 所以我们就说, 唉, 那么我们就用一个, 不管它上面成立两个学会, 到陕西省, 肯定真正作这个, 热心这个研究的就是一拨人. 那我就说, 我用一个学会的名字将来未来对准上面的两个学会.

Q: 上面哪两个?

A: 一个是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 一个是正在酝酿成立的中国妇女理论研究会. 86 年 12 月全国妇联召开第二次, 10 月份吧, 不是 12 月, 10 月份召开第二次理论问题研讨会的时候, 就成立这个筹备组呀, 我当时还是筹备组的成员呢. 省外的大概就是我, 朱楚珠, 还有一个男的, 当时非常活跃的一个男性. 我现在记不清那是谁了. 然后就是全国妇联的领导. 当时那个筹备组成立了, 没想到一筹备筹备了多少年, 因为 86 之后... 真正成立, 到了伯红他们手里才重新又开始了. 那个筹备组后来因为 89 年之后就整个都没有做. 这是我们叫的这么长的名字. 但是那时候的研究会呢, 我们当时的认识只是, 成立的话呢, 我们的认识就是, 因为在 80 年代中期, 妇女问题比较多一些, 现实冒出来很多这样的问题. 我们的兴趣点还都是怎么样来研究这些问题, 能够找出原因, 提些对策, 来影响政府决策. 希望通过政府的政策干预来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记得那个 80 年代我做的什么呢, 我作了那个陕西省妇女外流, 其实也就是拐卖妇女的这个调研. 做了什么呢, 做了女职工这个双重角色负担过重... 双重角色负担过重这样一个状况调查. 还作个责任制之后, 农村妇女的这个... 想了解一下责任制, 这个改革责任制对农村妇女带来的冲击影响, 作了一些调研. 这是 80 年代. 但那时候遇到的问题就是, 你想作调研的话呢... 很快随着政府的这个内部的这个机构改革, 妇联本身是个群团, 也从原先的办公室... 财政和办公室都在省委内部, 也自己独立出去了. 所以它自身的经费都很困难. 那么 86 年前后陕西省妇联成立了... 那时是这样的组织好几个呢, 有知识妇女联谊会, 有女新闻工作者联谊会, 还有呢, 家庭教育研究会, 有我们这个研究会, 那 86 年前后我们省妇联就成立 4 个这样的.

Q: 那些都是省妇联在组织?

A: 省妇联各个部门在组织. 所以很快地省妇联经费有限, 省妇联在 87 年就规定, 各家底下的下属学会不能用省妇联的钱, 经费你们要自筹. 所以我就遇到了, 研究课题本身就没钱, 当时经费就非常有限. 所以我们都采取办培训班, 普及班, 讲座收一点钱, 然后来支持一点活动. 这大概就是我们研究会在

86年到93年前后,都处于这么一个过程中间.当然这个过程的话呢,因为没有钱,那我们就自己定位,就说这是一个交流的平台,所以想要学会呢...会员在一块儿提供一些交流.那么89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办那个女性沙龙.办了两期.我记得3月份办的.我们题目-当时刚好是五四运动70周年了,我们就办了一个“中国妇女解放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与中国妇女解放,就想讨论这个关系.然后第二期我们的讨论题目是“性与商品文化”,(因为)感受到商品对这个的冲击.

Q: 噢,“性与商品文化.”

A: 对,对.因为当时那个商品对这个...重新有很多的...包括你象谈到象海南提到那个,为了创造改革开放的软环境,不惜牺牲一代妇女.我们想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提出我们自己的一些看法.但是马上...我们是3月份一次,4月份一次,就赶上了那个,

Q: 六四.

A: 六四.六四的话,我就因为有这样的沙龙也被扣上自由化的帽子.

Q: 噢.就前面的沙龙,就成为你的问题.

A: 也就是自由化的一个典型.所以89年90年就被政治审查.

Q: 就妇联系统内?

A: 对.省外面外面工作组就派进来了.

Q: 专门来对着你呀?

A: 我们有三两个人吧.我是其中之一.然后呢,这以后呢...本来我在妇联的仕途事实很看好的.(笑).就是86年那个研讨会开得好,开得成功,给我带来另外一个副作用就是我们领导突然看上我的行政能力了.回来之后,86年就把我,10月份就把我动员到办公室当主任去了.

Q: 省妇联办公室当主任?

A: 啊,啊.

Q: 同时你兼着研究室的主任?

A: 不是,没有兼.她希望我到办公室去,我说我不喜欢,我喜欢作研究,她给我的条件多宽:你把研究带到办公室来,我把学会带到办公室,我把研究带到办公室,我连图书资料室都带到办公室去.

Q: 这样的.

A: 就给了我很多的条件, 还是让我到办公室. 她可能看上我写文章. 因为办公室主任要搞综合嘛. 结果我还是不擅于, 我不擅于.... 办公室主任是协调的, 我不擅于在那些领导之间协调. 所以我也不是一个理想的好办公室主任. 到 89 年机构改革的时候呢, 我坚决又回到了研究室. 但是那个时候 (我) 还是我们省妇联认为比较能干的一两个年轻干部, 也就是准备是要进入到省委组织部的那个后备干部中间去了. 但是 89 年之后一政治审查, 我就是政治仕途全完了. 不但政治仕途完了没关系呢, 学会呢, 领导都不让换届, 不让搞活动了.

Q: 就研究会不让搞活动了?

A: 对, 所以研究会 89 年之后沉寂, 只搞一点活动.

Q: 但你当时, 你当时还是那个理论研究室的副主任?

A: 89 年回研究室我就是研究室主任了.

Q: 主任.

A: 不让干研究会的话呢, 那一阶段我搞了几个啥呀, 搞了一个“中国妇女统计资料 40 年”, 从 49 年到 89 年, 那就是 89 期间嘛。

Q: 全国的?

A: 全国的. 那是, 等于说是, 尽管出的名义是我们和全国妇联研究所合办的, 和老陶 (陶春芳) 一块做的, 所有的工作都是我领着我们的人做的. 我们自己做的. 也等于弥补了一片国内这方面的空白嘛. 后来又做了一个陕西妇女 40 年的一本画册. 这也是就等于又回到那个, 一个短暂的时间, 回到妇女史中间去做了一点工作. 那么这是, 这应该看作我的研究的第一个阶段吧.

就是说, 我觉得我第一个阶段来说的话呢, 就是我对妇女研究的兴趣其实是基于两点. 一个是现实的需要, 现实的这种, 不断地冒出问题. 这个问题中间... 我们这一代人有那种对社会的责任感. 另外呢, 对女性问题呢, 其实我呢, 还有个人成长经历也有一点点关系. 我是我们家的长女. 我爸我妈妈呢, 我爸是独子, 我妈是独女, 所以呢, 尽管我在家很受宠, 可是妈妈工作呢, 就把我 3 岁的时候送到老家由我奶奶带去了. 奶奶也很疼我, 但是我奶奶因为是关中农村嘛, 她老是跟别人说, “他儿没娃.” 那我当时都快上小学了呀. 我老是听我奶奶说这话, 我心里就觉得特别地, 就是在我那个非常小的那里面就觉得, 女孩怎么就不叫娃呢. 因为我不但有我, 我妈还有我两个妹妹呢, 我们有 3 个女孩子.

Q: 噢, 3 个女儿.

A: 她老说“她儿没娃,” 所以我在非常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呢, 我就想... 真的是对这个男女的这个有点敏感, 而且也就是培养我从小一种好胜心. 我就是一定要 and 男孩子争上一个高低, 我一定比男孩子强. 老那么说, 好象女孩子就不是娃呀. 所以我从小到大上学也就都学习比较好, 也一直都是比较好. 但是我到了那个初中升高中的时候, 由于家庭... 爸爸历史上有一点点问题, 所以我就没有在重点中学, 就到

了...没有进我们那个...我初中是西安中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重点中学.没有进重点中学,就被省女中要去了.因为我考分很好,那么我从混合中学到女中,我真的是很不适应.我觉得女中,当时的那个女中教育可能是说气氛比较沉闷,读书比较死.所以文革中间,你知道吗,我在文革中间后期教改的时候,很有意思.我就选了一个题目,就研究女校的历史,和怎么样就是将来改变女校的这种...学习的这种环境...

Q: 教学的模式.

A: 哎.所以我...其实我就脑子可能有那么一个对女性...还是说不自觉还有点点那种潜意识地对它的一种关注吧.所以到妇联来了以后呢,社会上这些东西,我觉得呢,我还不自觉地就特别关注,特别关注.还是想做点事情.

Q: 那,那时候你是在哪个大学毕业呢?

A: 西北大学.

Q: 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

A: 对.

Q: 然后分到妇联.你有想法吗?

A: 我当时是不想去妇联的.我当时是不想去妇联的话呢,可是为什么去妇联了,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插曲.我们班分到妇联的是个小姑娘.但是妇联其实是很有经验的.他们去的人她一看小姑娘,她不要.她说你们班有没有结过婚的,女的.我们班就我一个结过婚的.然后呢,她把档案调出来一看,这个要的人刚好是我爸爸的老同事,她的妹妹跟我在高中一个学校.我高中在学校学得很好,很有名气.她可能听说过.所以她一看,就非要要这个人.我们老师就跟我谈话.我当时是为了不让我们班这个...如果妇联不要,等于西安市少了一个名额,我们有一个同学就得分到西安市之外去了.为了不减少这个名额.然后她又说,你可以到妇联做妇运史事情.妇联当时有个妇运史研究室.那我说,哎,既然到不了高校,就去做妇运史也挺好的呀.

Q: 你自己想的还是到高校?

A: 对.我想到不了高校,我搞妇运史也挺好呀.那我去到妇联以后呢,他们一看我...刚一到妇联报名以后呢,他们正在开一个很大的一个表彰会.然后我说我要回...我(原来)的单位在咸阳嘛,我要去,还有手续没办完.她讲,你顺便到咸阳去给我采访,做一个先进个人的先进事迹的材料去.我说好.那我就顺便去了.我去回来就帮他把那个材料修改好.他们一看我文字功底也挺好的,他们说什么也不让我去那个研究室.就让我留到办公室了.就这么一段插曲.就这么一段插曲.所以我觉得那段其实也挺好的.就是知道很多底下的那种...今天是她逃婚了,明天是哪儿的妇女集体自杀了,哪儿还是拐卖了,就是很多你在媒体上看不到的东西,都通过那个看到了.

Q: 都是通过情况调查?

A: 情况调查呀, 内部通信呀—全国妇联的内部通信呀, 都看到了. 象它这样不断地刺激我, 使我一度曾经... 我个人... 真的, 从我个人的经历中, 我觉得如果说性别不平等, 不是那么突出. 我只感到两个在我经历中的性别不平等. 一个我从小我爸爸我奶奶这个态度, 另外一个就是... 招工的时候. 我是在农村结婚了, 跟赵宇共结婚了. 但招工的时候呢, 因为我当时在乾县呢, 又是一个学毛选积极分子, 在全县都很有名气, 省上的积极分子. 同时我球打得也很好. 我是我们县女篮的队长. 那么县长当时为了留住体育人才, 就把我安排在县上一个食品公司了. 我就是大批招工没之前, 我已经有半年在食品公司挂职, 然后平常参加一些体育锻炼, 去比赛. 所以在县上也很有影响. 可是后来当大批招工的时候, 当然我也不愿意在食品(公司), 呆在那儿. 我也就想出去. 可是我们县知青办把我推荐给渭河发电厂的时候, 他们回去一看, 听说我是结过婚的, 就不要我. 说什么都不要我. 那就因为我在县上还影响比较好, 我们县知青办说, 如果你们不要高小贤, 这 30 个招工名额你们都别要. 结果他们跟我们县呀, 扛了 20 多天.

Q: 就为了这个?

A: 就为了我这一个人扛了 20 天. 最后因为快, 招工快截止, 他们怕招工那个...

Q: 完不成?

A: 完不成, 怕把指标作废, 就把我接纳了. 你看气人到啥程度了. 大批人的招工是他们去到乾县去把他们车接回去, 拉到厂里.

Q: 这个农村去接的?

A: 啊. 只让我一个人回西安, 让我一个人单独去到他们那报名去.

Q: 就为你是结婚的女的?

A: 因为我是结婚的, 还把我在新工连, 有说坏的影响. 唉呀, 我在成长经历里面真的没遇到这么尴尬的事情, 知道吧. 我向来在哪儿都比较好强, 在哪儿都是学生的那种领袖, 就连当时打篮球都是这样子的, 从来没有受到这份... 就是说真的是感到自尊上很受到伤害. 我就觉得因为我结过婚, 可是男的也有结过婚的呀, 他们就没有什么. 那这是两次性别(歧视)上真的是感觉到了. 我还不是感觉太明显的这种性别歧视. 那么到妇联看到这些东西后, 这才真的意识到, 中国还是一个性别相当地就是不平等的国家. 这个时候才觉得推动性别平等是一个责任, 一个义务去做这件事情.

但那时候在理论上啊, 我觉得呢, 没有太多地接触西方的东西. 我当时呢在大学, 我选的毕业论文... 其实我学的是历史; 我关注是国际工运史. 我那时候, 我做的... 我记得我大学毕业论文做的是--说起题目可能你就觉得可笑--我做的是伯恩斯坦与康德哲学.

Q: 噢, 哲学题目.

A: 因为我觉得关注...那时候就考虑, 人到底什么目的? 我觉得...中国特别喜欢谈黑格尔嘛, 老是就觉得... 就是有时候为了目的手段都好象都不择一切呀. 但是我那时候对那个康德哲学这一点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那么它也训练了我一些在那个对思想史的一些功底吧. 那么我当时在做妇女研究的那个 80 年代初期的话呢, 我还是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间去做事. 我喜欢两种生产理论. 我也对那个异化理论比较感兴趣. 所以我在恩格斯《起源》的两种生产 (理论) 中间来看中国当时的这个...

Q: 男女不平等?

A: 男女不平等, 把它看作是因为人的再生产不被社会承认, 所以我也 (国内) 最早提出生育价值统筹的那批学者. 这就是应该看作第一个阶段. 那么我觉得呢, 对我来说...

Q: 转折在哪儿?

A: 在转折的话呢... 如果说在这个阶段理论上有一点点的突破的影响的话呢, 就是说, 我看到了就是... 我在 86 年... 就是那个谁, 在交大, 那个叫...

Q: 朱楚珠?

A: 朱楚珠 在交大办培训班, 把美国的那个谁... 我上次去看过她, 你认识, 那个人口学家.

Q: 喔, SUSAN GREENHALGH, 是不是?

A: 对, 苏珊.

Q: 喔, 你在 86 年就跟她认识的?

A: 对, 就是我开完改革与妇女研究论会, 当时朱楚珠也参加这个会-- 也是我们学会的嘛. 她请那个...

Q: SUSAN?

A: SUSAN 在这办了一个“妇女与发展”的研讨班. 那个真的是给我在发展 (理论) 上的一个启蒙. 然后呢...是我也有一些对“什么是妇女地位”, 把妇女状况和妇女地位有一个区分. 因为要是谈不清, 改革中间好象觉得...那时候老碰到一些西方学家来问, 中国的妇女地位是不是退步了? 我觉得为什么这么提呢? 这是不是对? 在中国这个政治环境熏陶下, 老让人家说我们不友好呀, 有什么政治企图呀. 当把这两个概念区分以后呢, 就有很好的那个 (效果) 了. 而且也通过它来指导影响妇女地位. 有一个新的框架. 比如说对资源的占有呀. 对吧? 开始有一个不同的思路了. 但那时候呢, 还没有就是说... 只是一个思路的开扩吧. 也开始知道呢, 对了, 也开始知道, 比如说苏联这种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发展, 这个怎么样对妇女产生的这个影响; 它也是个双刃剑. 谈到了它那个框架. 就是先介绍什么是发展, 然后多了什么依附理论呀, 世界体系理论呀, 等等. 然后再讲资本主义发展与妇女, 社会主义与妇女. 其

实是一个很开扩思路的东西. 这是我在 80 年代接触的一些西方的东西. 那么在研究上和在实际上的转折都和 93 年在天津那个会有点关系.

我觉得第二阶段话呢. 就是天津那个会呢, 其实第一次知道了性别 Gender 这个概念. 我觉得啊, 真的是个很好的分析工具. 真的是个很好的分析工具. 那么同时呢也认识了谭兢嫦. 因为我当时正在承担那个陕西省妇女法实施办法的起草. 本能地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我们应该推动立法嘛. 既然自己有一个起草法的过程. 能不能把它做得更好一些. 可是又觉得自己不懂法, 不是学法律出身的. 所以向她请教. 她说, 你可以办个培训班呀. 你可以作个项目呀. 这时我才知道什么叫项目, 她说你可以向福特申请呀. 我说那好吧. 后来我就向福特申请.

Q: 在那之前你没有申请过外来的资金? 都是妇联的资金在做这些活动?

A: 都是妇联的资金在做. 92 年, 不是, 92 年申请了一个小项目, 那就是...

Q: 生育健康?

A: 生育健康, 白梅他们在全国妇联那个大课题下, 我申请了一个小课题做. 那个课题在我研究上... 那个课题其实别看它课题小, 只有 1 万人民币, 那个对我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因为那个课题中间, 接触到了就是说, 它是一个质性研究. 我的导师一直在训练我, 就是质性研究方法, 另外是女性主义研究方法.

Q: 那谁给你们培训呀?

A: 女性主义研究方法是那个台湾的那个胡友慧, 质性研究方法是澳大利亚的朱明若.

Q: 那就是 92 年你做那个项目时候他们有培训呀?

A: 对.

Q: 给项目人员培训.

A: 他们向作项目人员培训. 然后我们是妇联的一个招标, 竞标. 然后因为我有社会科学背景嘛, 又有南开的那个背景嘛. 所以我就很容易在全国 (妇联系统中) 脱颖而出.

Q: 中标.

A: 不但夺标, 而且也... 朱明若也对我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后来呢 94 年, 不是, 93 年白梅让她给妇联系统培养人, 支持有 3 个人出国学习. 朱明若要坚持让我去, 她觉得我...

Q: 她当时就是福特邀请的? 福特请的?

A: 福特指定的一个指导老师, 然后送出去. 因为妇联系统的人都没外语嘛. 她是华裔嘛. 所以外语... 不需要外语嘛, 所以她邀请我们去 Griffith...

Q: 在澳大利亚?

A: 澳大利亚, 在 Griffith 大学待了半年嘛. 所以那个半年也是很好. 就是把那个我们做的课题又不断地深化, 来细细地来讨论, 修改, 研究. 真的是定性的方法的一个很好的训练. 所以我才知道...就是说, 如果说我在 (研究) 方法上, 有 85 年的南开是定量的训练, 有 94 年的澳大利亚的这个是一个定性的研究方法. 而且我知道定性更适合女性主义. 所以那个也是我正在定量 (方法) 走得走投无路时, 我觉得没法用定量的时候, 刚好他们...我对生育健康并不懂, 但是就是看到它是一个质性的研究方法, 我想有一个新的拓宽, 就报名参加了. 我觉得突然间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Q: 你就是 92 年, 你就接触到就是女性主义的质性研究方法.

A: 然后那时就倾听妇女的声音呀, 对不对? 那个以妇女为中心呀, 这些概念就开始, 都开始进入到脑子里来了. 研究者要有个平等的这个对话呀, 警惕自己的这个研究者这种高高在上的权力...

Q: 权力地位...

A: 权力关系呀, 在中间都已经开始接触到了. 那么 93 年, 就是说, 这个班是我开始尝试第一个做项目.

Q: 就是天津师范大学的班以后, 你就跟谭兢嫦在一块.

A: 就是她建议我做关于妇女法起草人的一个培训班. 那么这个培训班的话呢, 其实是什么呢? 这个培训班呢, 当时我们就请谭兢嫦请一些国内作法律的人帮助我们作培训. 因为全国 26 个省市都在起草省一级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 但是各个省都差不多是人大和妇联在做, 都缺这个背景, 所以我想办个全国的班. 我其实当时办这个班是我从马尼拉回来, 我记得我回来都 11 月 20 几号了.

Q: 93 年?

A: 93 年 11 月, 我从马尼拉回来, 时间非常紧. 所以我说服呢...福特所有的文本都特别地快, 就是说不等邮寄过去, 只要传真件过来, 一批就开始做. 可是全国妇联不让.

Q: 那怎么办呢?

A: 这时候呢, 我就跟妇联领导商量, 不能办全国的, 我说我们不办全国的, 我们办西部的.

Q: 陕西省的?

A: 不, 我们办西部的. 十个省的. 我说妇联不行呢, 我们就以研究会名义办, 然后我们把...立法是人大的, 我们把人大法制委拉上; 因为我们的主席就是人大法制委的委员.

Q: 陕西省妇联主席?

A: 对. 所以这样很容易. 我们就以这个办了.

Q: 这第一次活动, 六四后?

A: 它突然给我感觉学会活动比妇联空间大得多, 比妇联空间大得多. 这是一个感觉. 我觉得学会可以用. 那么还有就是 94 年去澳大利亚, 真的是看到了很多国外的妇女 NGO 的活动. 这时候让我重新来清理我自己, 就是说, 作妇女研究是为什么. 所以我觉得在女性主义研究方法里面就训练到说, 女性主义不标榜自己是客观的, 它就承认自己的研究目的, 就是为了推动促进性别平等, 对吧? 那我觉得在推动性别平等方面, 在中国这个环境中间--我做那个地方实施办法作了很多调查, 看到一方面与法律有关, 一方面其实法律一有了, 在现实中间, 很多妇女还不能够依法律去维持自己权利. 所以他们需要... 他们真的是... 很多弱势群体是需要有人给他们一点支持, 直接服务和帮助的. 那么我就觉得, 研究, 光作书斋的研究吧, 不够的. 而且你研究经费也缺. 你也不可能有组织那么大型的研究. 那么陕西的好处, 高校很多. 如果能把这部分知识女性组织起来, 用他们现有的知识为那些弱势妇女提供服务, 也是一种很好的途径. 这个也可以呢, 增加研究会的一些凝聚力, 使它不是那么太松散. 所以在我澳大利亚回来, 94 年的时候, 我就给福特递了第二个项目建议书, 就是要成立一个妇女法律研究与培训的一个中心. 福特当时说它的妇女法要支持北京 (的项目), 他们没有钱支持我们. 那么没办法, 后来我就把这个又给了那个... 一次偶然的知道美国的那个全球妇女基金, GLOBAL FUND FOR WOMEN, 给它了. 它倒是同意了, 但它一次最多只给 8000 美金. 所以它给了 8000 美金, 就是我办妇女热线, 就是我最初承办了妇女热线.

Q: 那人员就是研究会的成员参加了?

A: 研究会到那个时候成员已经变得呢, 不知道是谁了. 因为你想 86 年到 96 年, 10 年都过去了, 而且因为 89 年以后陕西学会中间的核心人物纷纷南下走了。

Q: 啊, 离开了.

A: 就是核心不在了, 只剩下少部分了, 就是少部分也... 那么, 我们就想社会公开招聘. 结果没想到报名的 200 多. 然后经过面试, 心理测试. 当时我在美国, 96 年我在你那儿...

Q: 在 SANTA CRUZ.

A: 在 SANTA CRUZ. 都是我的研究室副主任在做这个事情. 然后她就采取这套办法. 结果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人. 可是这个来了, 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做热线--我觉得在你家的时候, 你们很好地提醒我, 就是热线咨询也是有话语权的; 用什么样的话语去做热线辅导, 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后来当督导的时候, 发现这是个很突出的问题. 没办法, 又找钱. 亚洲基金来给我打电话, 有点作妇女的课题经费. 所以我就又开始做起来, 培训我的热线的人, 做到社会性别敏感. 那么从热线开始的话... 这个机构作为 NGO 机构的话呢, 就开始逐渐地有些实体的服务了: 96 年的热线, 98 年的法律援助中心, 然后还有呢, 99 年建的社会性别培训小组, 2001 年成立家庭暴力与预防辅导专线. 在这个同时呢, 还有一个作农村

发展的.因为我过去以前一直是研究农村妇女嘛.那时候也有一些基金会找,作农村发展项目,就找我.那我也是想,过去作研究嘛,作完了每次走时,都心里觉得好象特别抱歉一样似的.那有发展项目,我觉得给当地带来好处,我当然是非常乐意去做去.所以我们就开始做农村发展.那么这个机构呢,就是这样:在93年,从93年开始做第一个项目到99年法律中心成立,我们都是利用...就是都在忙着做项目,就是直接给妇女做点服务的事情.这个时候对NGO组织没有概念.就是说研究会也没有换届也没有选举.就剩下我一个光杆秘书长.所以我就一个人用我这个名牌申请项目.但是随着内部的项目不断增多,内部的资源也开始不一样.比如热线就特别穷,特别没钱.接受热线教训呢,就开始成立法律援助中心.我就一开始谈就是两到三年的项目,每年至少要有20万到30万,这个就很有钱.所以内部的资源的不平衡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时候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99年去英国参加那个中国妇女组织研讨会,这个时候...

Q: 在牛津大学.

A: 对.在这个会上有个主题讨论:北京和外地的NGO(在中国)的资源是不是一致的?大型NGO之间,妇女组织也不全是女性主义的妇女组织.还有一些就是...比如一些宗教性的女性组织,对吧?就是谈到这之间权力关系的时候,我才第一次意识到用什么样的思想,用什么样的理念和原则去组建一个组织也是最重要的.那我觉得女性主义本身它的那个批判性,它的那种挑战性,也应该包含在它的组织建构中间.向既有的男性组织文化当中那种等级制,精英制进行挑战.在会上还有一个讨论-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觉得也是引起我反思的--就是说大家讲的河南的现象.80年代中期曾经那么活跃,90年代那个时候整个一个销声匿迹了.

Q: 对,跨了,都跨了.

A: 这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所以我就说,怎么样这个组织能带起一批人,能够一块去做事,而不是那么精英的一个人完了,就整个都完了.这是我们应该引以为戒的,吸取教训的一件事情.所以99年回来以后我们的机构就开始(推动)怎么样把自己机构变得一个内部有更多的参与性,有更多的民主化的,可持续发展的.那个过程中,徐午也给了我点建议,说你可以把机构前几年的项目先做一个评估,然后再看未来制定自己未来的战略规划.所以我也给乐施会的中间不同的...象当时那个项目官员,他非常有经验,也给了我很多很好的建议.所以2000年的时候,我们就在乐施会(资助下聘请)一个协作者,协助我们制定了我们自己机构的未来五年的战略性发展规划.这个花了半年的时间,大大小小开了40次多的会.那个过程非常地烦人,但是呢非常好.

Q: 乐施会请的谁?

A: 那个...那个谁...周燕珍.

Q: 是哪的?

A: 是一个香港的,也作发展机构和作NGO很有经验的一个人.

Q: 那她来就是把你们各个部门...

A: 她是一个协作者。

Q: 各个部门的都来参加。

A: 对。既分又合。就开始先做那个规划训练嘛，先讨论外部环境，然后讨论内部的长项弱项，机遇与挑战，然后再看你们未来5年想做什么，能做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大家开始清理，研究会到底是个什么样性质的组织？每个小团体和研究会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呢，我们的内部机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最后大家就共同确定组织建设，未来5年的，一共有六条策略规划。前五条都是跟我们服务方针，服务方向有关系的。第六条是讲到我们自己组织的，就是要“完善研究会内部各种管理机制，探索建立一个参与性，民主化，可持续发展的妇女组织模式。

研究会在这几年来的发展中间，现在来反过来看，我觉得我们其实...如果就我们领域来看，我觉得我们可能也有3个圈。最初我们完全是在妇女研究这个圈里头，象我们参加93年老杜（杜芳琴）的会议呀，97年南京会议呀，每个凡是有会议，我们都派人去。我们也会带去自己的声音，自己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在研究领域中间。那么从我们在那个96年开始做项目，尤其作农村发展项目以后呢，我们就是说，我们就进入到一个发展领域。那我们把我们自己...我觉得我们进入到发展领域做一个服务的话呢，我们和国内其它一些机构还不一样。因为我们这个机构中多数人还都是学者出身，是有研究能力的。我们把自己研究--在方法论上我们称为是行动研究，也是我从女性主义研究方法里面得到的--那就是说这种研究是在我们作每个项目之前，我们有一个理论框架设计。然后我们去干预。过程中间我们不断地评估，不断地调整。最后我们还要看我们干预的成果。然后再丰富我们理论的东西。这是我觉得陕西研究会和其他有些纯发展机构还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自己农村发展中间一直特别关注就是社会性别与发展，怎么样本土化，怎么样本土化的问题。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尝试，也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在这个领域中间，我们也推动了社会性别主流化，在其他的发展领域主流化，我们也替很多的机构，国际机构做培训。唉呀，我们都没统计，不清楚，好象前几天他们统计我们在过去几年中间给自己给内部大大小小做过培训可能有近200场次。

Q: 社会性别培训？

A: 社会性别与发展。这样的培训，做了非常多的这个推动。

Q: 在陕西省？

A: 在陕西，外省。

Q: 外省？

A: 跟国际机构做。你象做到那个兰州，内蒙，我刚刚从内蒙回来。去四川，去合肥，去广州，去北京，做了很多。这是我们在这个发展领域中间。

也另外我们的项目点中间. 因为大家都谈...发展圈是很早就谈到主流化的问题. 但是怎么样主流化? 我觉得在很多发展机构容易贴标签, 就觉得你的项目设计是不是关注到妇女, 你的项目建议书中间有这样的东西就行了. 那怎么融入到项目中间去, 真正在项目过程中体现那种... 关注妇女眼前的社会性别利益转化到关注妇女的战略性社会性别利益? 你怎么样真正地(实现) ENPOWERMENT? 我觉得它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的. 那觉得我们的项目点呢, 象我们的丹凤项目点, 我们的宁陕项目点, 真正是做得一个好的样板, 也供不同的发展机构到这来学习, 来参观. 所以可能是我们在发展这个圈中间, 在国内的话呢, 在社会性别与发展这一块, 可能也是算是做得非常有影响的, 做得好的一块. 那也可以看到是机构对这一块的贡献吧. 那么在发展这一块, 我觉得对在发展里面特别强调权力关系. 就是它强调推动有参与性, 就是各种不同的相关利益群体都要参与到项目设计项目实施过程中去. 那么它训练了我们, 从方法到理念都训练了我们.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机构中间, 很多的事情... 所有的重大的事情都是大家来讨论参与, 在讨论过程中参与的. 然后一旦制定通过以后呢, 大家怎么来贯彻到中间去. 所以我们在 NGO 的管理和 NGO 内部的话呢, 可能在国内走得稍稍早了一点, 走得早一点.

那么我们是什么时候介入... 又开始把我们的领域从妇女研究的圈子又到了发展的圈子, 现在又开始到了 NGO 的圈子呢? 这个是 03 年, 02 年 03 年吧. 原先我们只是关注自己的 NGO 内部组织建设, 只是希望这个机构能够持续运转. 那么 03 年 SARS 期间, SARS 期间, 突然间来势这么凶猛的一场 SARS. 当时呢, 4 月 20 号可能是 SARS 的转折点吧. 是中国卫生部出来, 来谈话. 当时我们还在山阳作项目. 我们以为我们回到... 哎呀, 这时候不许外出了, 我们把我们很多培训都给... 把我们的培训都给推迟了. 就以为呢, 我们可以怎么... 我们可以安心写一些文章来, 把欠的人家债都还了. 最后回到西安没想到, 哎呀, 西安也出现了一点 SARS. 然后报上不断地报道, 一会儿抢购没盐了, 一会儿抢购没口罩了, 整个一个恐慌啊. 我们就感觉到, SARS 已经从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开始变成... 如果处理不好, 会变成一种社会危机.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呢, 作为一个 NGO 组织, 我们就是让大家都有一种社会责任感, 怎么样在整个一个公民和政府之间架一个桥梁, 动员公民起来, 使整个社会公民自觉能够和政府一起共度这个难关. 所以我们采用了... 我们自己 25 号在一块商量. 我们花了 5 天, 整整只有 5 天的时间, 我们从策划, 到设计, 到找资源, 我们印了一套就是 3 张一套的大宣传画, 3 个宣传画, 走进西安市的大小社区了. 那场影响非常好, 影响也非常大. 媒体来说, 你们做了本来应该政府做的事情. 然后这场出去后呢, 我就觉得就是说, 作为一个 NGO, 尤其作为一个女性主义 NGO, 就在整个公共危机中间发生了... 我觉得是, 社会看到了这个 NGO 的力量, 也看到 NGO 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 我们可能从我们自己成长的经历中, 也感觉到我们有责任在促进整个中国公民社会的成熟. 那么中国公民社会成熟, 一个有待于这个法制环境的不断完善. 中国的整个法制环境还是非常有限的. 那怎么完善? 你不能坐着等着政府给你完善, 你必须也象我们做妇女运动推动性别平等, 你必须主动地怎么去做事情去. 你做事情了, 才能推动. 所以以后呢, 我们就会在这个 NGO 推动一些我们自身能力建设. 然后我们也去做一些其他的草根 NGO 的能力建设, 而且我们逐渐也开始往那些 NGO 的网络... 成立一些网络. 你象 2000 年在西安, 中国 GAD 的网络, 是我们发起, 成立的. 2000 年的第一次会在西安开的. 那么现在我们又组织了一个陕西 NGO 网络, 学习网络.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筹划着跟西北地区 NGO 网络, 我们也正在讨论我们未来的第二个五年规划当中, 我们希望在西北 NGO 网络中间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那么我们还跟北京还有一个网络.

Q: 我们再聊. 换一盘.

A: 我说得太啰嗦了 .

Q: 没有. 换一个.

(换带。访谈第二部分)

Q: 研究会现在有多少人?

A: 研究会现在呢, 全职员工, 可能我觉得目前最新的数据应该是 19 个吧, 还是 20 个, 然后会员有 120 个吧.

Q: 全职 19 人, 还有会员, 会员有 100 多.

A: 还有一些兼职.

Q: 会员 100 多个, 这 100 多个就是全省, 陕西省?

A: 还有些志愿者, 还可能有 100 多志愿者. 志愿者和会员是交叉的. 我们是说, 在我们入会资格中间, 作两年以上志愿者才有资格申请作会员. 所以还有一半多志愿者不是会员.

Q: 那会员怎么样, 交会费?

A: 交会费.

Q: 每年怎么交?

A: 每年 50 块钱.

Q: 那你刚才说的, 要在西北地区发展网络, 你因为陕西已经具有这网络了, 是吧?

A: 陕西已经建立起来了.

Q: 然后你要西北地区, 西北地区怎么... 打算怎么建立?

A: 因为相对来说, 现在甘肃呀, 新疆呀, 宁夏呀的那个 NGO 还是比较小, 比较弱. 所以最近正在由我们出面跟那个兰州大学的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合作, 我们申请一个西北地区 NGO 能力建设项目, 是个两年度的项目. 我们会通过一系列的培训来提供给这些 NGO 能力建设的一个途径. 当然不仅仅是培训, 还有呢, 比如说, 他们可以到我们机构来实习. 另外呢也向, 就

是说跟一些大学志愿者开放,也训练他们对中国 NGO 有更多的认识与锻炼,以便他们毕业后可以选择 NGO 作为他们的一个职业,一个选择.

Q: 你准备向全国大学生开放吗?

A: 这个看能力.我们其实已经尝试做了两年的大学生实习基地,今年也申请了志愿者.我们的办公地点也有限.我们现在就是说也在跟几个 NGO 联合在做,跟北京包括也在联合在做,看怎么样把这个大学生实习能建立一个基地.因为我们接纳的人也是有限的.

Q: 就是全国各地的?

A: 不是.西安,西北大学的和陕西师大的.她在这算实习.今年我们接待了一个外地的,来了两个月,是合肥的一个来实习,作志愿者.我们这个可能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思路呢,就是说我们...因为很多 NGO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正式注册,没有会计,对财务贷款没有经验.我们也可能准备向一些草根 NGO 机构,除提供财务指导之外,如果他们需要的话,也可能会有为他们代管一些财务.目前我们在 NGO 圈里,财务管理是非常有...有很好的声誉.我们的会计也非常有经验.所以我们可能今后这都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Q: 因为你做过的很多工作,一下子可能这短短的访谈时间也谈不完.那其中有一件,就是我知道这个还持续下来的,一直持续下来的那就是“红凤工程.”把那个能够说一下吗?

A: “红凤”的话呢,真的是在 95 世妇会议这个大背景下的一个产物.我当时 94 年 8 月份刚从澳大利亚回来就碰到我们陕西省妇联在召开一个十个地市的妇联主席的会议,在讨论怎么样迎接 95 世妇会.当时他们出了很多的主意,可是那些主意都缺参与性,只有少数人参与.我觉得 95 世界妇会大会在北京,参加这样的盛会应该动员所有的妇女,特别是那种边缘的一些妇女,能够让他们参与.那么陕西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村妇女占的比例相当大,怎么样让农村妇女能够参与进来呢?我脑子里一下子想起来,我因为长期在农村作项目嘛,我也熟悉农村妇女.陕西民间文化历史悠久.农村妇女其实他们非常心灵手巧.他们会剪纸,他们会刺绣.那么我也曾经做过一些那个...做陕西妇女画册的时候,我也在陕西各个地方也收集了很多这样的...联络了一些这样的民间艺人,知道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出色的.所以我就心想,哎,能不能用他们的刺绣组成那样一个大绣帐.因为在那个妇女历史上有绣百花帐的那个传统,那是给神庙罩的.那我就说,能不能组织一个大绣帐.倒底多大呢,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把它赶快就借了一个计算器,就在那算,啊,如果是 5 寸乘 5 寸,这个小片子有多少,最后又算了一个 4 乘 7 米的,可能刚好能够容纳 1008 块图吧.那我说就叫它“千花帐”吧.我就把这个想法下午就跟我们主席说.我说我们能不能可以动员全省妇女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主席觉

得这个点子挺新颖的,她马上支持了我,马上支持了我.那我就开始了找人设计,找人那个策划等等.就是,哎呀,那些年的过程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我们从设计到买布,到自己裁剪等等,就把那个绣帐终于做出来了.那个绣帐的话呢,是用了...我记得是用了十几种的颜色不同的(布)做那个底色,然后拼成了一个展翅飞翔的那个红凤凰,象征了中国妇女运动,也象征了中国女性的这种精神状态吧.

那么这个绣好...当时最初呀,我是想把它献给联合国的,因为看到很多都给联合国献礼嘛.中间还没做好的时候,看到了报上登的天安门的那个红灯笼拍卖成功,卖了几百万吧.我想,这个千花帐绣出来,绝对是个宝贝.你想,一千名农村妇女,她那个传统的绣品呀,多好呀,知道吧.那多有艺术价值呀.然后呢,又在一个世妇会这个背景下.我想,能不能把它卖掉,卖点钱,做点妇女的事情.因为在这之前呀,做项目,老是向国外申请,老是用人家的钱.我就说,什么时候中国也有一个基金会呀.我就盼望有个自己的基金会.我说,这个钱如果能卖得好的话呢,能成立一个基金会,我们不是自己就可以搞事情了吗.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的话呢,我们就想,呀,把那个绣品要把握得非常呢...要让它每一幅都绣出精品来.

我们做了两遍.第一遍上来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出差去了,开那个妇联那个会议;是我的副主任去布置任务去了.她没说清楚.结果很多妇联都理解就绣那个妇女的工农商学兵的模范英雄人物像上.我说,哎呦,这东西上来,能体现妇女的参与,但是它没有那个艺术的那个价值,而且那个布的颜色也不好看.最后呢我就说,作废不要.我就到处带着人,到处选布料子,跑遍了陕西的各个纺织厂.原来我觉得纯棉的是最好的,最后发现找不齐那么多颜色的布.最后就用了那种缎子的,就基本定了下来.那个缎子定下来以后呢,缎子太软了不行.我们又跟一个厂联系,底下加衬,加完衬以后一剪以后,又脱絮,又送去锁边.那锁边都是我们一个一个在个体户上那么锁出来的.然后再把那个十个地市的妇联每找一个人,带着他们到我们的那个民间艺术馆去参观,看着就是我们就要的是这样,你就给我找那些老妇女,会绣花的,要传统的,民间的图案,然后他们就把他们每个人最想的,就是最棒的,最拿手的那个图案绣出来就行了.所以等于第二次做了一遍.真的绣出来的非常得好.那么我们后来开那个专家评审会的时候,民俗专家在里面看到了.把那个做好,非常的不容易做好.那每个环节其实都非常地艰辛.那么大.你知道我们拼图的时候怎么拼的吗?一千多张哪.我们就一个人念着那图,绿的,红的,蓝的,另外一个人抱一大垛,绿的,红的,蓝的,就这样摆在一个很大的地上,把那地擦干净,我们就跑到那,跪到那,然后跟那个设计者站在很高的地方再看那个好不好.合的时候,要后头好多地再去编号,这是第几排,第几座,得一米一米地合在一块,一米一米地收到一块,缝完了后一米一米才能对在一块.然后没人能帮我们把它组合起来,又跑一个锦江刺绣厂去,让人家那工人呢,说迎接世妇会,义务帮我们做呢,才帮着又一点一点,因为弄不好不平嘛.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从开始设计到最后花了一年.

Q: 经费哪儿来的?

A: 赞助拉的.

Q: 噢, 跟民间赞助的.

A: 钱是找企业要的. 然后中间有一个企业要挂他们的名字, 我们还不干. 我们说先找一家企业愿意, 但是要挂他们的名字, 我说, 这是全省妇女迎接世妇会的, 挂个你企业的名字, 不伦不类的, 我们不要. 后来我们出来找我们的副省长, 一个女的副省长, 跟她说. 她也感动了, 她说, 我给你联系个企业吧, 它不会让你挂名字的. 又找了个企业. 另外可能还让财政上替我们出了个十多万. 然后呢, 我们又中间每个环节都是给人家说, 比如说, 衬子到国棉五厂去, 人家可能不问我们要点钱. 组合那个刺绣厂也不问我们要钱. 就是这样的话, 它最后终于完成了. 完成了以后呢, 到世妇会期间没有拍卖成, 只是在那展出了, 可以看到, 反正也是蛮好的一个印象. 回来以后呢, 才交给一家拍卖行去卖去了. 它可能没有经验. 第一次没有拍成, 但是没有拍成的那个... 想没拍卖成的那个消息出来后把它给炒热了. 就是说, 大家都在思考说, 一个手机的吉祥号, 一个汽车的一个什么号, 都能卖到几十万. 一个这么多的妇女做的这么有艺术价值的一个, 一个珍宝, 而且几乎不会再有了, 因为那些绣品有可能都 80 岁, 70 多岁的老太太, 他们一去, 一死掉的话呢, 现在这代年轻人不会绣这种东西了, 它就再不会复制的这么一个作品. 怎么竟然没眼力的, 就是, 中国的这些有钱的人这么没眼力的买这个东西呢? 结果这个消息一出, 就是失败的消息出去以后, 第二天就有人来要买. 他们当然知道底价了, 就按底价买走了.

Q: 多少钱?

A: 35 万. 然后呢, 拍卖行提了百分之十, 我们就拿了三十一万五. 做什么呀, 三十一万五. “红凤”的起头, 源头是怎么起来的呢? 是世妇会完了, 那段太累了, 我就休假, 回临平, 我插队的地方去了,

同时还遇到事情, 就是说, 我们邻村, 离我们村才只有 3 公里的一个村子, 一个女娃呢, 考上大学了, 那都九月, 都九月二十几号, 二十几号了, 说还没有去读, 没有去上大学, 家里没钱. 她妈只好说, 你今年别读了. 到明年苹果长了, 结了苹果卖了再去读书. 唉呦, 我就觉得在西安呀, 乾县离西安不远呀, 怎么都有女孩子读不起大学的. 我当时就给她讲, 我说, 你给那女孩让她来找我. 她如果读不起书, 让她找我来. 然后我又跑去给镇那个妇联干部说, 我说, 你去给那个公社, 给那个小镇带话去, 如果那个女孩再上不了学, 你让她到西安找我来. 这 (件事) 就启发了我做“红凤”. 因为当时教委... 就是刚刚教育并轨, 开始要求收学费. 那时才收... 学

费不高,大概就是两,三千块钱吧.竟然就有女孩子读不起书来了.那我说,大学如果读不起书来的话,那小孩她肯定看没希望就不读了.所以我就想,唉,这个钱能不能做点支持搞搞教育的事情.那么红凤绣帐卖的钱就叫了个“红凤工程”...起名叫“红凤工程”.也刚好我觉得有一点跟中国文化相结合.中国文化不都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嘛.红凤也预示了女性成材的这个工程的事情.这就开始了.

第一年,当时的利息,存款的利息还比较高.是百分之十五吧.十或十五.所以我们觉得呢,一年的利息呢,还有三,四万,我可以支持十个学生,一年一千,四年就四千.但第一年就是为了把规模做大,所以支持了二十个.结果没想到,这个通知给各个地市发下去,要求一定是贫困户--贫困就是说,家在农村的,人均纯收入在中国的贫困线以下的.结果我们就报来了近百份.后来越来越多.那一年总共报了一百五十多份申请书.然后你看着那份...就是说个个都是求学的过程非常的艰难的历程.读完了高中都很不容易,现在要读大学根本没办法.所以不可能说二十个(以外)就不管了.那没办法怎么办呢?后来我就给主席说,想请媒体,咱们开个新闻发布会,看看媒体能不能帮忙.结果媒体一公布就开始有人打电话,就开始社会捐赠了.然后企业...记者帮助找企业.所以这样,我们第一年就支持了八十多个.这样的成功...

Q: 就是企业的承诺了.

A: 企业就开始...有四个企业.也是记者帮我们忙.四个企业各(支持)十个.然后各个都是零散资助,就做了八十多个.我们就把第一年最困难的,基本都送走了.所以这就启发我了.第一年做了这么多,那第二年有人知道了,我们就得这样一点一点地做下去.那么这个做得也蛮艰难的,就是...

Q: 第一年就是九六年开始的?

A: 九六年做了(支持了)八十多个.我记得是八十四个人,八十四个还是八十五个人,走了.那么第二年的时候呢,做了六十多个.那么这样每年你要靠媒体你都要宣传呀.那这个机制...你这个是光花钱的事情.那我就觉得怎么样宣传呢.我们每年都想个招儿吧.第一年是媒体,第二年我们还给企业家写信,把西安市上所有中等企业的那个名单找来.给每个企业家都发了信.第三年我们办了网页,上了网页.这样呢就是每年每年做宣传.但是慢慢呢,我们在写信的过程中发现呢,这些孩子们呢,就是说“红凤”呢,从农村到城市呢,她们不仅仅是缺钱的问题,还有她们到城市来出现的那个...那个就是...被贫困压的那个自尊心呀等等,可能都被那个...

Q: 城乡的等级?

A: 城乡等级弄得她们在... 我觉得是在整个心理的发育上都有太多的压抑, 一定有很多不健康的一些情绪使她们没有呢... 不能完全那么轻松地和城市孩子一样地去享受那个大学生生活. 所以我就开始就觉得“红凤工程”呢, 也还得做点其他的事情. 后来我们就找到社会找钱, 给她们办了点社会性别培训, 提高她们的性别意识. 也希望她们通过性别意识提升意识到贫困和女孩子的问题不是她个人的问题, 而是这个文化, 这个体制的问题. 也希望她们回到家乡能做点事情.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也感到这个贫困面很大. 所以也希望这种“红凤工程”事情, 就是这种爱心能够传递, 就是她们也培养这种社会责任感. 就是现在... 因为大学生跟那个农村的贫困人口不一样. 你这贫困是短暂的, 你毕业后, 就业以后, 你可能就会有... 稍稍有好的收入. 所以也慢慢启发她们自己发起成立一个承诺: 五年以后再资助一个大学生.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真的是看到她们的成长. 等那是哪一年... 我们是 2000 年, 2000 年的时候, 我们给她们第一届毕业生办了一个“放飞新世纪的红凤”, 所以由她们自己组织的一个, 选了几个大学论文, 选了办了一个筹备小组, 她们自己排节目, 她们当主持人, 只有一个男主持人是从大学里面借来的. 她们自己当主持人, 她们自己演节目, 筹办那个舞台的时候, 看到她们演节目, 我和小宁呀, 我们俩眼泪就不断, 真的是不断. 因为我们都看第一批, 我们太熟悉了; 看看 (当初) 爸爸, 妈妈带她们到我们办公室那份不自信, 那个畏缩, 坐在那儿, 那个境况. 到了 2000 年的她们自己跳现代舞, 她们自己演话剧, 当主持人, 真的感到她们那种成长. 所以在那个过程中, 真是一个... 也是帮她们, 她们办一个, 有那个简报, 她们自己也可以写点东西. 那么“红凤”因为一直坚持着管理也比较严格, 另外呢, 这个对学生的选择也非常严格, 所以中间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的丑闻, 而信誉越来越好. 所以它这个影响面呢, 中央台也在做, 它就慢慢地影响出去了. 有一批稳定的资助人了. 包括很多朋友圈的都给我很多的支持, 高彦颐他们, 贺萧他们都捐过.

Q: 现在放给妇联了是吧?

A: 我离开, 我是两千零几年呀... 我是 04 年我离开那个研究室主任的岗位, 所以我就把“红凤工程”呢交给了下一任的研究室主任, 班理在做. 班理是宣传部管的, 她自己在宣传方面呢, 还有的她的长项. 因为我当时做“红凤”呢, 也不能全力以赴在做, 它只能占我很小的机构; (另外) 还有研究会. 所以班理来了, 她可能在... 她在宣传面上比我有两个好的策略. 我觉得是她做成功的. 一个呢就是, 她在宣传上都动用了多种媒体. 另外呢, 她把妇联... 她把红凤跟妇联的工作结合得更好. 我当时红凤是独立做的, 没利用妇联的资源. 为什么呢? 我一直把它梦想滚动为一个中国民间的妇女基金会. 这是我的梦. 就是说, 我希望一旦这个基金会成立的话, 我不希望它跟妇联太多的瓜葛, 因为会有很多的行政的干预它的独立性. 所以我一

直保持它的独立性, 希望它运作成一个民间的基金会. 当然这个就看你... 没有妇联经费上的支持, 别的支持, 有它的难度嘛, 对吧. 那么班理的话呢, 她可能是一个也继承了红凤前期的, 本来就是正在越来越好的这么一个基础, 再加上媒体的宣传做得好一些, 再加上妇联现在就是主席呀动用妇联的资源做, 所以它这些年资助学生更多, 资助更多.

Q: 行, 那你看看能不能再谈谈你对于这个 NGO 组织, 倒不是一定是你自己这个研究会--因为具体应该讲得比较多了--就是对中国这个妇女 NGO 组织的发展, 你对未来的前景怎么看? 还有它跟妇联这个组织的关系.

A: 其实... 分两块说. 先说我觉得中国 NGO... 妇女 NGO 从 95 世妇会, 它可以说是, 在中国 NGO 圈里面, 就是发育比较早的, 也应该说发展比较好的. 但它不是始终最大的. 它比不上环保 NGO. 环保 NGO 我觉得它起步以后呢, 它走得比较快, 它尤其我觉得环保 NGO 这几年形成合力, 在推动政府, 在一些环保倡导上比妇女 NGO 做得好一些.

Q: 你看什么原因呢?

A: 我没有细分析, 我没有细分析. 这可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但我觉得环保 NGO 现在倡导上真的是做得非常漂亮的几件事.

Q: 它进入主流的这个传媒中间了.

A: 它媒体有一部分人. 它不仅仅是媒体这一拨人在做, 你比如它那个怒江大坝的那个事情, 它是好多 NGO 在一块儿. 而且它还有一批很有影响的一些科学家都在里头做. 所以我觉得... 这个我没细心再去分析. 但是就是说, 这个现状就是这样子. 那现在的妇女 NGO 组织的话呢, 分为好几类. 一个就是, 你可能熟悉的, 还在高校里面, 都是研究的, 对吧? 研究的组织严格上, 不可以... 在大学下的 NGO 不一定叫... 可能称不上 NGO, 因为真正的 NGO 它是要你独立性, 在社会公开注册的, 你知道吧. 那么大学的 (研究) 中心还更象一个大学底下的一个研究派出机构一样的东西. 它的经费, 人员, 它是另外一套的组织. 那么这个草根的这种妇女 NGO 组织吧, 我觉得呢, 这些年新生的不多. 这是它面临的问题. 不象其它的呢, 环境呀和发展的 NGO 呀, 我觉得那种草根的越来越多. 中国的妇女 NGO 差不多都是九十年代, 95 世妇会前后 (产生的); 这些年新生的不多. 这是我感到比较担心的一点.

Q: 对, 我们也关注到, 比如这次“95 + 10”开会, 你看这个妇女组织基本还是些老人在那儿吧; 大概有影响的这些人物.

A: 还有一拨新人. 可能机制也有问题. 那个会议, 新人又加不进去. 但我觉得整个 NGO 现在来讲, 在国内来说, 尤其是在这两三年, 还是发展的势头比较猛. 两个现象来自... 怎么说, 一个我觉得新的, 小的 NGO 真的是非常多地出现. 我不管去甘肃... 我去广东参加华南地区的那些 NGO 能力建设, 我去甘肃参加甘肃地区的民间组织与核心社会的研讨, 还是见到了很多的小的...

Q: 妇女的?

A: 不是, 我就说 NGO 组织, 不是说妇女. 那个 NGO 组织草根的很多. 我说国内的 NGO 整个趋势.

Q: 哪个方面的? 环保的?

A: 环保的, 发展的, 残疾人的.

Q: 啊, 残疾人.

A: 智障, 不叫残疾人. 叫智障. 智障儿童... 智障人士的工作, 社会福利的, 老年人的, 都有, 挺多的, 这是我的感觉. 就是说中国 NGO 发展的势头比较好. 两个,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我觉得从现在呢, 更多地谈到 NGO 的内部的管理和能力建设. 如果刚开始 NGO 是一拨人自发组织起来的, 就是“七, 八条枪杆”组织起来这么大. 现在在 NGO 的能力建设方面, NGO 系统内部的治理, 领导力的培训, 筹款, 财务管理这一套的培训, 就出现了很多做 NGO 能力建设的中介机构, 上海的庄爱玲, 北京的 NPO, 李来来, 广州的周建刚.

Q: 是中国自己在做?

A: 成立自己的 NGO 组织本身使命是作 NGO 的能力建设, NGO 的系统建设.

Q: 不是国外基金会支持作?

A: 不是, 他们的钱也是国外基金会申请来的. 但是人家是怎么...

Q: 在作 NGO 组织能力 (的工作).

A: 对, 也成立一些这样的机构, 也在作. 然后你看 NGO 的研讨会, NGO 的网络会就特别多. 举一个现象. 我在去年以前我的电子邮件基本处理的是和我研究会机构的信, 项目呀, 活动呀有关系的. 那么我今年就发现, 我很多的信处理的是和外国 NGO 的关系. 我要参加很多网

络. 你看, 北京现在有七家 (发起) --我们也发起人之一--要跟 NGO 和政府对话, (关注) NGO 和政府关系的一个网络. 前不久刚在南京开了第一次会议. 然后七家是轮流做庄的, 筹备会, 研讨会.

Q: 全国的一个网络, NGO 的网络.

A: 全国的网络.

Q: 不是光是妇女的?

A: 不是, 做其他的. 妇女的呢, 我们有个“六家妇女 NGO 能力建设”, 那个项目是...

Q: 在北京开的会.

A: 在北京. 今年马上要在河南开第二次. 这是我们筹备的, 我们牵头的吧. 我还要参加那个... 就是跟国际计划组织“陕西 NGO 学习网.” 就是有些能力建设的事情. 然后再加上不同地方 NGO 能力建设请你去做点培训, 所以我觉得 NGO 挺活跃的. 相比之下, 我感觉妇女的 NGO 弱一点, 赶不上这个...

Q: 发展的势头?

A: 赶不上 NGO 发展的势头, 还维持在 90 年代末的那个情况. 我不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 我也没细细地去考虑这个事情去.

Q: 那你自己对于就是今后... 从你自己来说, 除了你刚才讲的这个研究会作为一个地区的这个网络的发展, 你要做很多推动之外, 你对你自己个人还有什么打算?

A: 我吧, 我一直在创造机会. 几年我都想在研究会退到二线来. 因为, 怎么说呢, 我成天说... 我可能自己也批判自己, 可能研究学者情结还存在吧, 还想作点研究. 特别是作点妇女史的研究. 因为 50 年代那段历史我做的时候那么多资料, 我觉得我还有点割舍不掉. 这是我一个对 50 年代那一段历史想做一点东西. 另外我觉得 80 年代那以后, 我又是一个亲历者; 亲身参加了整个这个妇女研究, 在农村发展 (的活动), NGO 的发展中, 我都有很多自己的经历. 另外, 我也想把这些东西的经历本身作为一个对象去思考; 也想作点研究. 就是有很多这种研究的梦. 目前只是说没时间. 看看能不能等逐渐的退下来吧. 我这话老说, 我也现在不敢给别人说我什么时候能退下来了. 但我还是在做退的准备.

Q: 那要是你今天退下来, 这个研究会能象你在一样这样运作吗?

A: 现在研究会内部也有一套机制化的运作机制了. 我觉得呢, 其实我不在, 他们做得也挺好的.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在研究会起心理上稳定的那种作用. 另外, 这个可能现在暂时还是缺一个人代替. 我现在还不能马上退下来. 我跟大家说, 我觉得, 我把陕西妇女研究会的这个建设也是看作一种研究, 一种创新, 就看它在推动中国整个政治民主化进程中间, 它是个CASE. 由它的成长来感受到外界的各种的机遇, 挑战, 障碍和我们自己的能动性. 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在实践中做学问的一篇论文. 我是希望把它做好. 既然已经做到现在, 我是希望有一个好的交代. 如果纯粹是个人兴趣的话--也包括现在目前这个工作也太累, 真的, 女儿老批评我是“透支健康”, 真是超负荷地工作--我可能早就扔下了. 但是就觉得这篇文章没写完呢, 还不到画句号的时候, 就是这种想法.

Q: 好, 非常感谢你.